

## 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 安全觀的形成

Chinese Perception of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Security Concept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錢坤玄

Chiu, Kun-shua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ilitary Affairs  
China  
Security Re  
the Formation  
Chiu, Kun-

ationalization"  
Lu-hsun 33  
tategy toward  
Chih-chia 71  
endence and  
h-Yueh 107

reference on

ung. 143  
Change and  
Perspective  
Li-pao 187

.....232

# Chinese Perception of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Security Concept

Chiu, Kun-shua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Chin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the three dominant actors in Northeast Asia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have enjoyed a stable and cooperative, if not equal, relationship in several decades. China's relations with and perception of these two countries, however, varies from time to time. While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have strengthened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China accordingly advocates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as the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lations. However, it is not the concept itself a new on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hina's practice of multilateralism in foreign affairs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is a new area worth of carefully examination.

**Keywords:**

China,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New Security Concept

# 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

邱坤玄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 摘要

中共、日本與美國的三方關係，無疑是冷戰後東北亞國際政治中最微妙與複雜的問題，在三邊關係中，美日兩國雖然存在不平等的關係，但是長期的聯合，使得關係變動的可能較少，因此中共如何認知美日的關係，就成為三方關係的主要變項。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實際上受到中共與美日兩國關係的影響，在1970年代以前，由於中共與美日兩國處於相互對抗的兩個陣營，因此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採取反對與批判的態度；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由於中共與日本、美國相繼建立外交關係，同時中共基於反蘇統一戰線的需求，甚至肯定美日安全關係的功能。1980年代中期以後，中共與蘇聯、美國三方關係趨向和解，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就採取不主動批判的默認態度。冷戰結束後，美日同盟關係日益強化之際，中共提出「新安全觀」作為冷戰後國家安全關係的準則，但是在深入分析後，新安全觀在國際政治上並無新意，對中共而言，積極倡議與推行多邊機制，則是研究中共外交的新領域。

**關鍵詞：**

中共、美日安全、新安全觀

## 壹、前言

中共、日本與美國的三方關係，無疑是東北亞國際政治中最微妙與複雜的問題，在三邊關係中，美日兩國雖然存在不平等的關係，但是長期的聯合，使得關係變動的可能較少，因此中共如何認知美日的關係，就成為三方關係的主要變項。1950與1960年代，美日安全關係的主要目標是蘇聯、中共與北韓。<sup>1</sup>1970與1980年代則是以蘇聯為對象。在反蘇統一戰線的需求下，中共於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曾公開表示「美日安全條約」的必要性。<sup>2</sup>1991年蘇聯瓦解之後，美日對中共的崛起格外關注，而中共則對美日安全關係的強化深為憂慮。

本文主要目的在描述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從系統的觀察中尋求中共對此關係關注的重點。本文認為中共關注的核心在於同盟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產生的作用，對中共而言，如何與美日關係處於一定的平衡狀況，不致因為兩國關係過於密切而導致日本成為政治、軍事大國，或是兩國關係陷入衝突，促使日本重整軍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 貳、冷戰時期的評估

冷戰時期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的評估，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從建立政權到1972年與日本建交，中共將美日安全關係視為美

11950年2月14日中共與蘇聯簽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日本為假想敵人，同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為了要阻止蘇聯指使的北韓的攻勢，必須以日本為基地，因此翌年9月8日簽訂的「美日安全條約」，提供美軍駐日的法律依據。1953年8月，美國與韓國簽定「美韓共同防禦條約」，中共隨後於同年11月23日與北韓締結準同盟的經濟文化合作條約，1960年6月美國與日本新訂「共同合作與安全條約」，蘇聯與中共於1961年相繼與北韓簽定「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兩大集團之間軍事同盟對抗的態勢十分鮮明。

2吳學文等著，《當代中日關係（1945-1994）》（北京：時事出版社，1995），頁228。

國圍堵中蘇共的重要一環，對於重新武裝日本的問題也非常關注。第二階段為建交後至1982年中共提出「獨立自主外交」，中共在反蘇統一戰線的需求下，美日安全關係反而成為對抗蘇聯的工具。第三階段為1982年之後，中共對於日本再武裝與台灣問題，格外重視。

### 一、美日安全關係建立與修訂

1950年2月14日中共與蘇聯簽定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成為二次大戰之後東北亞地區第一個軍事同盟，其主要目的在「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國家之重新侵略」，<sup>3</sup>顯示中共對當時美國對日佔領政策改變的反應，<sup>4</sup>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為了將日本轉化為支援韓戰的後勤基地，同時使美軍駐日合法化，因此於1951年9月簽訂「日美安全條約」，中共強烈指責美國未邀請中共參與對日合約的簽訂，嚴重違反了1942年聯合國宣言、1943年開羅宣言與1945年波茨坦宣言等國際協定，中共堅決反對。對於「美日安全條約」的簽訂，中共認為其主要原因是美國已經陷入韓戰的困境當中，其目的在重新武裝日本以支援韓戰，並未日本完全變成美國軍事基地取得合法的依據，此約與1951年8月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美澳紐三邊條約將形成對中共與蘇聯包圍，威脅亞洲的和平與穩定。<sup>5</sup>

除了文宣批評之外，中共也採取了一些相應措施。1952年8

3參見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頁400。

4中共學者認為美國總統杜魯門於1947年3月12日發表的「杜魯門宣言」，是美國改變對日政策的重要標誌，其改變包括在經濟上，由嚴格限制改為大力扶植，支持日本經濟的復興；在政治上，由嚴懲右翼勢力改為鎮壓民主力量，加強了日本政府的統治力量。參見吳學文主編，《日本外交軌跡》（北京：時事出版社，1990），頁10~14。

5參見周恩來「關於美國等國家簽訂舊金山對日合約的聲明」；「關於美國宣布非法的單獨對日和約生效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1951-1953》（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頁38~46；66~70。

月，中共向蘇聯提議延長蘇軍自旅順撤軍的期限，直至兩國與日本締結和約為止，<sup>6</sup>顯然中共欲進一步結合蘇聯力量以抵制美日的聯合。此外，中共也在國際上策動反對舊金山和約的輿論，1951年2月在柏林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通過了反對單獨對日媾和的決議，<sup>7</sup>這些行動這個時期，「美日安全條約」在本質上雖獨立，但實際上卻「陷入了美國霸權的勢力範圍並受到美國的控制。」<sup>8</sup>，因此中共批評的焦點是在美國對亞洲地區共產主義的圍堵，日本只是執行美國圍堵政策的工具。

1960年1月美日簽訂「共同合作與安全條約」，取代舊的安全條約，新的安全條約比較具有對等性，日本的地位相對提昇，自主性也較強。<sup>9</sup>中共認為美國因為實行侵略與擴張政策，因此造成政治孤立與財政困窘，為了抒解困境，要求日本分擔更多的軍事與財務責任，以條約規範日本防衛美國在日本的基地，並且將美日安保範圍擴大至西太平洋地區，在必要時將日本捲入美國發動的核子戰爭之中。<sup>10</sup>

相較於1950年代對美國圍堵政策的批判，中共對1960年的條約則是以日本軍國主義的復甦為批評重點。<sup>11</sup>中共認為日本在新安全

6依據1950年2月中共與蘇聯簽訂「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之規定，一俟對日和約簽訂後，但不遲於1952年末，蘇聯軍隊「自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952年8月中共主動提出延長蘇軍撤退的期限。1954年10月，中蘇又發表聯合公報，宣布蘇軍將從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並將該根據地交由中共完全支配。見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頁25~26。

7吳學文主編，日本外交軌跡，頁25。

8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176。

9楊志恆，「美日安保之沿革及其對台海安全之影響」，戰略與國際研究，第二卷第二期（2000），頁9~11。

10陳毅，「關於日本與美國修訂和平條約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1958（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年不詳），頁202。

11Wang, Jianwei., and Wu, Xinbo. "Against Us of With Us?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f America's Alliances with Japan and Korea," presented for *America's Alliance with Japan and Korea in a Changing Northeast Asia* (Stanford, Calif.: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pp. 9~11.

條約中提升了防衛的責任與力量，同時美國正逐步升高對中南半島的武裝干涉，因此中共擔心新的安全條約將成為美國對中南半島戰略的重要支柱。除了政策宣示之外，中共對此約並未採取相應的行動，可能因為中共當時正值內外關係交困之際，<sup>12</sup>因此無法及時做出反應，直到1961年7月11日，中共才與北韓簽訂「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同盟之間對立的態勢十分明顯。

1960年的「美日安全條約」為期十年，由於當時日本佐藤政府的努力，與美國達成歸還沖繩的協商，因此條約得以自動延長。中共雖然對此採取一貫的批評立場，<sup>13</sup>但是此時中共與美國、日本關係已逐步改善，到了季辛吉（Henry Kissinger）1971年7月中國大陸之行公開之後，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的批評已大為降低。

## 二、中共與日本建交與友好和平條約的簽定

中共認為1971年是美帝國主義衰退的開始，主要因為美、蘇爭霸與美國長期執行侵略、顛覆、控制與干擾政策的後果。對於美日安全關係的批評，從過去的侵略與反對中共的本質，到目前強調美、日之間的經濟衝突。但是中共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憂慮仍然未減，在1972年中共與美國發表的「上海公報」當中，中共就重申「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願望」，<sup>14</sup>此段顯然是針對當時的日本佐藤政府，並且藉此促成日本反對黨壓迫政府加速與中共關係的正常化。

雖然美國較日本更早打開中國大陸之門，但是日本與中共關係

12當時中共內部正處於大躍進失敗後的經濟重整時期，在國際上則與蘇聯關係加劇惡化，蘇聯在1960年7月撤出所有協助中共發展的技術人員與終止技術協助合同，對中共經濟打擊甚大。見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頁117。

13吳學文等著，當代中日關係（1945-1994），頁143~147。

14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頁420。

正常化的進程卻遠超過美國。日本與中共以八十二天的時間就完成建交的談判，於1972年9月29日簽署建交聯合聲明，而中共與美國的正常化過程卻則持續了將近六年。中共與日本建交談判的過程中，對於美日安保的問題採取低調的處理方式，周恩來對此曾表示「中共與日本關係友好但不排斥他國。對第三國關係、「日美安全條約」問題，中共雖有意見但可以不觸及，因為這是日本的事務」。<sup>15</sup>甚至根據當時兩位訪問北京的美國眾議員表示，周恩來還曾經私下對他們表達希望美國軍隊續留亞洲以維持此地區的穩定的意見。<sup>16</sup>在此時期，中共在日本與蘇聯衝突的議題上，也支持日本的立場，<sup>17</sup>中共對「美日安全條約」的批評因此大為減少。

1978年8月中共與日本簽訂的「友好和平條約」當中載入了反霸的條款，雖然條約強調不針對第三國，但是其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蘇聯，反蘇成為中共與他國發展關係的標準，「美日安全條約」的價值也是以此標準評估。1978年10月鄧小平副總理訪日，在與日本首相福田赳氏會面時發表的談話中，對於包括「日美安全條約」和加強自衛力量在內的日本外交方針表示理解，<sup>18</sup>同年12月15日中共與美國宣佈將於1979年正式建交，中共與美國、日本的關係達到二次大戰後最高峰，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共呼籲在國際上要組成一個最廣泛的反蘇統一戰線，美國與日本成為中共反蘇的重要爭取對象。

15吳學文等著，*當代中日關係（1945-1994）*，頁187。

16Harding, Harry.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p. 45.

17例如日本北方四島領土、漁業糾紛以及蘇聯所倡議的亞洲集體安全等問題，中共均表示支持日本的立場，參見Wang, Jianwei., and Wu, Xinbo. (1998), pp. 17~18.

18吳學文等著，*當代中日關係（1945-1994）*，頁228。

### 三、中共的「獨立自主外交」

中共與美國建交之後，在台灣問題上並不如預期一般，得以順利解決，而在國際上「以蘇劃線」的外交政策，<sup>19</sup>也不符合中共的利益，妨礙了中共與其他國家關係的發展，最重要的是反蘇統一戰線消耗了國家資源，無法全力發展經濟，因此中共在1982年「十二大」提出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強調在國際上不結盟、不對抗，以及不針對第三國。在冷戰結束前，中共再度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復甦感到疑慮，特別是被中共視為頗有鷹派色彩的中曾根康弘於1982年底出任首相之後，積極提倡強化美日「同盟」，<sup>20</sup>其後又發生歷史教科書問題、光華寮事件、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以及在1987年軍事預算佔當年日本GNP總值的1.004%，突破了不超過1%的慣例，這些發展都使中共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傾向感到憂心。

### 參、1997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

蘇聯瓦解，冷戰結束之後，美日聯盟以防衛蘇聯攻擊日本的假設頓失基礎，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美日兩國政府對於日本參與的程度、範圍與性質均不滿意，認為日本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必須調整在國際安全事務中的角色。1993年日本首相細川護熙成立了以朝日啤酒公司董事長樋口廣太郎為會長的「防衛問題懇談會」，針對冷戰後日本之安全政策進行研究，1994年8月，世稱「樋口報告」的研究成果出爐，該報告建議日本的安全政策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支

19張小明，「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劉山、薛君度主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13。

201979年5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美時，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以同盟一詞稱呼日美關係，但這一用詞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1981年5月，鈴木首相訪美時與雷根總統發表聯合聲明，雙方首次共同使用了「美日同盟」字眼，但在日本國內引起很大爭議，直到中曾根首相之後，「美日同盟」才被廣泛使用。參見張蘊嶺，*伙伴還是對手—調整中的中美日俄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254。影響」，《國際問題研究》，第一期（1999），頁35。

柱：(1)多邊主義，(2)美日聯盟，以及(3)獨立的自衛能力。<sup>21</sup>其中多邊主義被視為是未來日本安全極為重要的部分，但是這並不代表日本要放棄美日聯盟關係，而是以日本憲法與美日聯盟為依據，在國際安全事務上擔負更多的防衛任務。此份報告成為1995年日本公布的「防衛計畫大綱」的藍本。

在美國方面，當時的柯林頓政府對於美日聯盟的角色，著重於雙邊的經濟安全領域，顯然與日本的多邊主義安全觀有所差異。但是1994年春季的北韓疑似發展核武的危機，使美日兩國對聯盟的定位有了共識的基礎。<sup>22</sup>冷戰時期美日聯盟的模式已不足以應付類似北韓的核武危機，日本缺乏相關的法律規定以支援美國應付朝鮮半島的挑戰。因此東京與華盛頓咸信兩國聯盟的政治可信度完全建立在運作層次的可信度之上，兩國必須堅守對聯盟的承諾。為了達成這項目標，兩國政府對亞太地區的政治安全環境，以及兩國間的各種安全合作議題進行了密集的研討，在獲致以下幾項重要政策成果後，最後於1997年9月完成了「美日防衛合作指針」<sup>23</sup>（以下簡稱「新指針」）。

### 1、1995年2月「美國東亞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sup>24</sup>報告（以下

21Green, Michael J. "Defense or Security? The U.S.-Japan Defense Guidelines and China," in Lampton, David M. edited, *Major Power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1), pp. 76~77；晉林波，「美日同盟再定義的背景、過程及其影響」，《國際問題研究》，第一期（1999），頁35。

22Campbell, Kurt M. "The Official U.S. View," in Green, Michael J., and Mochizuki, Mike. edited.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tudy Group Papers, 1988), pp. 85~87.

23「新指針」全文請參見 "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Web Site*. <<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guideline2.html>>.

24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1995).

簡稱「東亞安全戰略」）。美國將信守維持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承諾，繼續在亞太地區駐紮約10萬名軍隊。美國聲稱美日關係對美國的太平洋政策及全球戰略目標至為重要，美日安全同盟為美國亞洲安全政策之關鍵，因此絕對不能容許貿易衝突破壞安全同盟。美國將加強與日本的安全合作，其中包括日本提供美國在作戰行動中更多的後方支援，以及探索共同研發「戰區飛彈防禦系統」。

2、日本1995年修訂的「防衛計畫大綱」<sup>25</sup>。首次提出維持和平行動是日本防衛政策的主題之一，但是在計畫中有11個領域強調美日聯盟對日本安全的重要性。對於日本防衛能力的角色，則由過去的防止對日本小規模的有限攻擊，轉變為「日本周邊出現狀況，將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形成影響時，日本政府必須依照憲法與相關法律與規章採取適切的行動以為因應」。<sup>26</sup>這成為嗣後出爐的「新指針」內「周邊事態」條文的來源。

3、1996年4月「美日安全聯合宣言：邁向21世紀的聯盟」(*Japan-U.S.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sup>27</sup>。（以下簡稱「聯合宣言」）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宣言中再次肯定以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雙邊安全合作關係，並且認為該條約是美日兩國在21世紀達成雙方共同安全目標於維持亞太地區穩定與繁榮的重要基石。兩國領袖同意對1978年雙方簽署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進行檢討，以建立緊密的安全合作關係。

25參見Green, Michael J., and Corrin, Patrick M. edited.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p. 359~367.

26Green, Michael J., and Corrin, Patrick M. edited.(1999), p. 363.

27 "Japan-U.S.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Web Site*. <<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security.html>>.

上述文件的公布顯示美日兩國對於21世紀聯盟的角色與功能已經取得共識，下一步就是要獲得法律的保障，以落實共識的實施。在此之前，日本於1976年公布了首次的「防衛計畫大綱」，兩年後就制訂「美日防衛指針」，此次也依循前例在1995年公布新的「防衛計畫大綱」之後，在1997年9月美日兩國就制訂了新的防衛合作指針。

為了有效執行「新指針」的相關規定，日本政府也於1998年4月相應提出了：(1)「有關發生『周邊事態』時為確保日本和平安全之措施之法律」；(2)自衛隊修正法；與(3)日本政府與美國政府就日本自衛隊與美軍之間相互提供後勤、物品與勞務之協定」等相關法案<sup>28</sup>，日本國會於5月24日通過了這些法律，強化了日美安全合作的可信度，同時有助於防止威脅日本安全事件的發生。

在美日兩國調整同盟關係的過程中，對於中共可能的反應十分注意，但是雙方都強調同盟關係的調整並非針對中共，而是以朝鮮半島的情勢為重點，此外1995年9月在沖繩島發生的美軍強暴日本少女案件，促使兩國對於維持穩定的政治關係格外重視。美國強調穩定的美日聯盟關係是促成亞太經濟繁榮的主要因素，中共也因此受惠良多。<sup>29</sup>此外，美日聯盟還可發揮「瓶塞」作用，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sup>30</sup>因此中共應能接受此種調整。而日本對於中共因素的顧慮更為明顯，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甚至主張在「聯合宣言」的初稿中不能出現「中國」的字眼，<sup>31</sup>以免中共誤解日本的動機。

28 "Japan-U.S.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29 Carter, Ashton B., and Perry, William J.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pp. 100~101.

30 Yoshihide, Soeya." Japan's Dual Identity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presented for *America's Alliance with Japan and Korea in a Changing Northeast Asia* (Stanford, Calif.: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http://www.stanford.edu/group/APARC/>>

31 Green, Michael J. (2001). p. 78.

「聯合宣言」的發表時間恰值1996年3月中共對台試射飛彈後一個月，中共認為此係針對北京而發，事實上美日兩國原訂在1995年11月大阪的亞太經合會領袖會議中發表「聯合宣言」，但是由於當時柯林頓總統正為聯邦預算案與國會周旋，因此延至1996年4月才訪問日本，因此並不是針對台海危機而發佈宣言。

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同盟的關注核心在於同盟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產生的作用，其它的議題則是以此核心作為思考與評估的基礎。中國大陸學者默認美日同盟可以作為限制日本成為軍事大國的「瓶塞」，但是他們更關注美日同盟也可以成為日本發展軍事力量的最好掩護，發揮了小雞孵化過程中「蛋殼」的作用。<sup>32</sup>因此中共在評估美日關係時將會面臨一種微妙的困境，若美日關係陷於衝突，有可能導致安全關係的破裂，美國對日本失去了「瓶塞」的限制功能；但是若兩國強化安全合作關係又有可能使日本破殼而出成為高科技的軍事強權，兩者都不符合中共的利益。對中共而言，同時與美國、日本發展良好關係，反而成為最佳的選擇。

在1995年之前，中共學者認由於冷戰後美日同盟缺乏共同敵人，加上經濟的摩擦可能引起雙方的政治衝突，促使美國撤軍，而加速日本建軍。部分學者也從美日兩國內因分析雙方同盟關係可能惡化的原因，比較重要的因素包括美國新孤立主義；日本崛起的民族主義；新上台的柯林頓政府缺乏對安全事務的經驗與重視，<sup>33</sup>這些因素都使美日同盟的前景蒙上陰影。

1995年以後，由於「東亞安全戰略」報告公布，以及美日之

32 劉江永，「1996-1997日本形勢報告」，1996-1997國際形勢報告（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1998），頁40。

33 陸忠偉，「亞洲安全中的中日關係」，世界經濟與政治，第三期(1993)，頁23~35；Christensen, Thomas J.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 60.

間的汽車貿易糾紛和平落幕，因此中共學者認為美日得經濟摩擦已獲有效控制，而柯林頓政府開始關注亞洲的安全事務。<sup>34</sup>至此以後，中共學者對美日同盟的討論大都集中在日本防衛角色的擴張及防衛能力的提升。

雖然美日兩國在調整聯盟關係的過程中，一再強調並非針對中共，「聯合宣言」也只提到北韓是不穩定的因素，而且美日兩國都認為中共將在亞太穩定與繁榮上扮演一個積極與建設性的角色，因此兩國將進一步加強與中共的合作，但是這些並不足以消除中共對美日聯盟戰略意圖的擔心。在「新指針」形成期間及公布之後，中共官學界就作出全面系列的批判，在「新指針」公布前幾天召開的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中，還特別指出「擴大軍事集團、加強軍事同盟，無助於維護和平、保障安全」，<sup>35</sup>顯然是針對「新指針」而發。學界則是從「新指針」的簽訂動機、適用範圍、性質與影響等方面加以批判。到了1998年底，日本政府決定從1999年起與美國共同合作「戰區飛彈防禦系統」之後，此項議題就成為中共學者關注的焦點。綜合而言，這些批判是圍繞著「新指針」是否助長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復甦，以及台灣是否在「新指針」的適用範圍之內。

### (一) 動機

冷戰結束後，美國國內對於應當採取何種總體戰略存在著新孤立主義、選擇干預、合作安全與絕對強權等不同的主張，<sup>36</sup>中共認為冷戰後美國政府是採取積極擔負領導世界的政策，以北約東擴及

34 楊運忠，「美國政府進一步調整對日政策」，《世界經濟與政治》，第七期(1995)，頁61~65；楊伯江，「日美貿易摩擦何以趨緩？」，《現代國際關係》，第三期(1996)，頁18~23；Christensen, Thomas J. (1999), p. 61.

35 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全文可參見「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人民網。<<http://zg.people.com.cn/GB/9508/index.html>>

36 Posen, Barry R., and Ross, Andrew L.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1996/1997), pp. 9~43.

提升美日同盟關係作為其全球戰略的兩大支柱，美國藉「新指針」在亞洲以與日本聯手牽制中共，同時在日本憲法範圍內使日本承擔新的軍事任務。<sup>37</sup>

中共認為冷戰後日本重新確認日美聯盟，主要原因是日本國內右翼份子用以對付「中國威脅論」，<sup>38</sup>其主要目的已不是依靠美國保衛日本而是欲藉助美國使自衛隊行動範圍擴及海外，形成日美共同主導的亞太安全新秩序，最終實現其軍事與政治大國的目的。<sup>39</sup>但是也有較為保留的看法，認為日本國內確有主張恢復軍國主義者，但是很難形成明顯的趨勢，因為時代與客觀環境已經改變，日本人民的態度，周邊國家與國際形勢，都是制約此種主張的重要因素。<sup>40</sup>

### (二) 範圍與影響

中共官方對「新指針」的關注焦點是其適用範圍，認為美日安全合作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生的雙邊安排，這種安排應嚴格限制在雙邊的範疇之內，<sup>41</sup>特別是不能涉及台灣，中共認為無論是直接或間接把台灣海峽列入美日安全合作範圍，都是對中共主權的侵

37 劉江永，「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與中日關係」，1997-1998國際形勢報告（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1998），頁18~19；晉林波，「美日同盟再定義的背景、過程及其影響」，頁35。

38 宋德興、閻學德，「冷戰後日本右翼勢力抬頭的三大表現型態極其影響」，《國際政治》（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第十一期(2000)，頁141~143；王希亮，「論『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及相關法案的出台」，《國際政治》（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第十一期(2000)，頁91~92。

39 劉江永，「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與中日關係」，頁19；劉長敏，「戰後日本國家發展戰略軌跡初探」，《外交學院學報》，第四期（2000），頁39~42；肖歡，「淺析冷戰後美日同盟的調整」，《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第三期（2001），頁106~109。

40 張歷歷，「世紀之交的亞太安全形勢和中國對日政策」，《外交學院學報》，第二期（2001），頁60。

41 人民日報（1997年6月11日）四版；人民日報（1997年9月25日）四版。

犯和干涉。<sup>42</sup>此時中共官方的聲明不再像1950與1960年代一般的長篇大論，而是針對主題，做出全局與原則性的回應。

學者的評論則是集中在「新指針」的「周邊事態」的問題，就適用範圍而言，1978年「舊指針」以對付「日本有事」為重點，「新指針」則強調了在對付「日本『周邊事態』」時的美日軍事合作的具體措施，其中有兩項最令中共學者關注。<sup>43</sup>

第一、日本在「新指針」中同意對美國提供三個方面的40項合作：(1)日美兩國各自採取單獨行動方面。包括戰時援救難民、海上搜救、撤離非戰鬥人員，以及根據聯合國安理會決議進行海上船舶檢查等。(2)日本對美軍行動提供的支援。包括美軍使用自衛隊及民間設施等；日本提供武器彈藥以外的補給、運輸人員、武器、彈藥、燃料等，維修美軍艦船、飛機和車輛，以及醫療、警備、通訊合作等。(3)聯合行動方面的日美合作。包括周邊發生事態，自衛隊保衛生命財產及航道安全而收集情報、警戒監視、空中管制和公海掃雷等。使美日安全合作的性質產生了變化，由原來美國保衛日本、日本租借基地給美國的單向防衛體制，開始向日美雙向軍事合作體制轉變。因此，日本在所謂「周邊事態」時已有可能直接捲入地區衝突，使美日同盟成為以介入周邊衝突為主的外向型同盟。

第二、台灣是否包含在「周邊事態」範圍之內，也是中共最關注的問題。1960年的安保條約提到「遠東範圍」，依據當時日本政

42人民日報（1998年2月5日）六版；人民日報（1998年5月4日）四版；人民日報（1998年5月20日）四版；人民日報（1999年7月10日）一版。

43晉林波，「美日同盟再定義的背景、過程及其影響」，頁38~39；劉江永，「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何以令人憂慮」，現代國際關係，第十一期（1997），頁7~12；金熙德，「日美同盟的『再定義』及其未來趨勢」，世界經濟與政治，第七期（2000），頁13~18。朱鋒，「『周邊事態』：矛盾與問題－對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和相關法案的思考」，現代國際關係，第八期（1999），頁23~26；殷燕軍，「日本新安全戰略及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載於中國外交（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第一期（2001），頁38~39。

府的統一見解，大體包括菲律賓以北及其周邊地區，韓國與中華民國也在其中，中共當然無法接受，但是當時中共與日本尚未建交，因此無法就此進行協商。在中共與日本建交之後，「新指針」對「周邊事態」模糊處理，強調非地理概念，而是指事態的性質而定，如此讓美日有行動上的迴旋空間。但是對中共而言，模糊處理事實上是掩飾美日的真正意圖，將台灣包含在「周邊事態」範圍之內，以達到干涉台灣問題、牽制中共的目的，嚴重妨礙了中國的統一。

### （三）「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

美國早在1993年就已經提出研發TMD的計畫，而且在1995年的「東亞安全戰略」報告中就已提及擬與日合作研發的計畫，<sup>44</sup>但是日本遲遲未同意加入，直到1998年8月31日北韓試射飛彈飛越日本領空之後，日本才決定與美國共同研發。中共認為此一研發乃是針對中共的飛彈能力。美國宣稱發展「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及在亞太地區與日本共同研發TMD，主要是為了應付伊拉克、伊朗及北韓等「流氓國家」的飛彈攻擊。中共雖然公開宣稱不反對TMD本身，認為「TMD如果用來防空，保護一國的駐軍，則是正當的。但是在TMD旗幟下搞NMD，或使其成為NMD的前沿部署，或被用於增強軍事同盟，超出有關國家正當防衛的需要，那麼中國就會堅決反對。」<sup>45</sup>就實際而言，中共對美國發展TMD的態度，是基於以下三項重要的考量。<sup>46</sup>

#### 1、美國發展NMD及TMD將大幅降低中共的核武嚇阻能力。中

44最早討論美日合作研發TMD，以及日本最初反對加入此計畫的經過，參見Sanger, David E. "New Missile Defense in Japan under Discussion with U.S.," *New York Times* (Sep 18, 1993,) P. A1. 在1995年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報告當中，使用「探索」（explore）與日本合作研發TMD的文字，以掩飾日本不支持此計畫的態度。

45「沙祖康司長就NMD問題在『吹風會』上答記者問」，人民日報（2001年3月4日），參見〈<http://www.fmprc.gov.cn/chn/9374.html>〉。

共表示依據美國的估計，中共目前擁有18-24顆長程洲際飛彈，足以襲擊美國本土，但是在美國發展NMD之後，這些少數ICBM的嚇阻能力將被有效削減，因此中共只有在研發更精準的第一擊核子武力及增加其ICBM的數目下，才能有效提升其核武威嚇能力。

- 2、在美國仍然對中共存在不信任的情況下，美國部署NMD，勢將加深兩國的疑慮，造成雙方關係的緊張。
- 3、美國若在亞太地區發展TMD，並且將TMD技術轉讓給台灣，對於中國的統一將造成嚴重的障礙。

因此中共認為美國發展TMD將對中共的國防安全與國家統一造成嚴重的威脅。中共是否會因此加速其核武現代化的研發，因而引起雙方的核武競賽？就目前為止，中共並未有如此的計畫，因為中共在加入「全面禁止核試條約」(CTBT)之後，就無法進行核武現代化，改進其核武器的質量，但是中共卻可以進行核武器的淘汰與更新，以提高其安全性與可靠性。

## 肆、中共「新安全觀」

在美國與日本強化其同盟關係的同時，中共自1996年就提出應共同培育一種新型的安全觀念，之後中共領導人在多邊、雙邊場合多次呼籲國際間要建立新的安全觀，但是對其內容與運作方式，仍然缺乏系統的分析，而被視為一個形成中的概念，尚待充實。2002

46 「導彈防禦系統真能增進安全嗎？－軍控司司長沙祖康在第二屆中美軍控研討會上的發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chn/1469.html>](http://www.fmprc.gov.cn/chn/1469.html)；馮瑞雲，「美日共同開發並部署TMD對東北亞地區安全構成威脅」，中國外交（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第8期(2000)，頁100~103；Finkelstein, David M.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and China's Current Security Perceptions," in Romberg, Alan edit *China and Missile Defense: Managing U.S. PRC Strategic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Stimson Center/CAN NMD-China Project, 2001), N. pag.

年7月31日，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sup>47</sup>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共在新世紀下的安全觀念和政策主張，可以說是對美日強化軍事同盟的理論回應。而在實際行動上，近年來中共積極參與多邊機制的運作，其中「東協區域論壇」與「上海合作組織」被中共視為是新安全觀的具體成功實踐，在「十六大」召開之前提出系統的說明，並且明列於「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之中，顯然新安全觀已經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將成為中共倡導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工具。

### 一、「新安全觀」上的多極世界

冷戰結束後，中共對世局的評估，在「十四大」時認為兩極格局已經結束，世界正朝向多極化方向發展，但是此種格局的形成將是長期與複雜的過程。「十五大」延續了「十四大」的基本判斷，認為多極化趨勢在全球或地區範圍內，在政治、經濟等領域都有新的發展。「十六大」也認為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有力條件。從這些評估當中可以發現多極化仍然在「發展」當中，相當程度反映出中共對世界格局的主觀期盼。事實上中共對於美國超強的意願與能力感受深刻，當1996年4月17日美國與日本發表「聯合宣言」，強化美日聯盟機制以因應21世紀新局之際，中共即於4月26日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在上海合組「上海五國會議」，並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提出應共同培育一種新型的安全觀念，強調以通過對話增進信任，通過合作促進安全。

從1996年之後，中共領導人就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建立新安全觀，1997年3月，中共在與菲律賓共同主辦「東協區域論壇」信心建立措施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了適合冷戰後亞太地區各國維護安

47文件全文參閱「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jzzyhy/1136/1138/t4549.htm>](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jzzyhy/1136/1138/t4549.htm)

全新的新安全觀。<sup>48</sup>在此之後，中共領導人在「東協區域論壇」及其他國際場合，不斷強調和倡議此一新安全觀。1997年4月，江澤民訪問俄羅斯，與葉爾欽總統簽署發表「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雙方主張確立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安全觀，強調必須摒棄「冷戰思維」，反對集團政治與使用武力解決紛爭，以對話協商增加信任，通過雙邊、多邊合作尋求和平與安全。<sup>49</sup>1999年3月26日江澤民在瑞士發表「推動裁軍進程、維護國際安全」的講話，對於新安全觀作了全面的闡述，<sup>50</sup>此次談話是在美國為首的北約展開對南斯拉夫轟炸後兩天發表，因此針對美國的意味濃厚。江澤民在講話中認為冷戰思維的舊安全觀，以軍事聯盟為基礎，以加強軍備為手段，無助於保障國際安全，更不能營造世界的持久和平。因此必須建立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安全觀，其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通過對話、協商和談判建立互信，解決爭端；建立國際合作機制，以追求共同繁榮。

但是同年5月8日卻發生美國軍機轟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事件，雖然美國宣稱此係「誤炸」，實際上顯示美國單邊主義的行為，以及美國獨強的現實。在美國同時強化與日本及北約的安全關係下，中共則是在國際間持續提倡新安全觀，並且提升與友邦的關係。2001年6月「上海五國會議」於上海舉行年會，六國元首於15日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及打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上海公報」，並支持啟動六國貿易和投資談判進程，「上海合作組織」正式成立。<sup>51</sup>同年7月16日，中共與俄羅斯簽定「中俄

<sup>48</sup>轉引自楚樹龍，「冷戰後中國安全戰略思想的發展」，《世界經濟與政治》，第九期（1999），頁12。

<sup>49</sup>人民日報（1997年4月24日）一版。

<sup>50</sup>人民日報（1999年3月27日）一版。

<sup>51</sup>「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jzzyhy/l128/l130/t4499.htm>〉

睦鄰友好條約」，顯示中共積極推動世界多極化、平衡美國超強的企圖。

## 二、「新安全觀」的內涵

在中共領導人提出新安全觀的概念之後，中國大陸學界開始對「新安全觀」的背景、內涵與影響做出解釋與論述，高度讚揚新安全觀的價值。<sup>52</sup>綜合中共官方聲明、領導人講話以及學界的論述，中共的新安全觀可以從安全的範圍、威脅的來源、國際安全的基礎與方法等面向加以分析。

第一、「新安全觀」的安全是綜合性的安全。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安全的範圍亦隨之擴張，新安全觀主張除了傳統以主權為核心的政治與軍事安全之外，還要注重經濟、科技、社會、文化與環保等一系列的新安全問題，因此「新安全觀」強調的是綜合性的安

<sup>52</sup>相關的論述可參考章一平，「冷戰後世界的新安全觀」，《現代國際關係》，第二期（1997），頁38~40；楚樹龍，「亞太地區安全觀、安全結構和安全戰略」，《現代國際關係》，第五期（1997），頁2~7；閻學通，「中國的新安全觀與安全合作構想」，《現代國際關係》，第十一期（1997），頁28~32；王勇，「論中國的新安全觀」，《世界經濟與政治》，第一期（1999），頁42~45；孟祥青，「把握後冷戰世界發展趨勢實現跨世紀國家綜合安全—江澤民新安全觀初探」，《外交學院學報》，第二期（1999），頁30~35；楚樹龍、彭春艷，「冷戰後國際安全理論的發展」，《現代國際關係》，第四期（1999），頁28~33；楚樹龍，「冷戰後中國安全戰略思想的發展」，頁11~15；韓麗，「無處不在的威脅—新安全觀概念質疑」，《世界經濟與政治》，第十期（2000），頁64~69；高恒，「多極化世界需要樹立新安全觀」，《世界經濟與政治》，第十一期（2000），頁22~27；李秋發，「江澤民」新安全觀「探析」，《南京政治學院學報》，第二期（2001），頁14~17；李寶俊，「中國新安全觀的提出及其主要內容」，《中國外交》，第七期（2001），頁14~18；李曉敏，「中國的新安全觀」，《和平與發展季刊》，第二期（2002），頁44~47；趙慶杰、高衡，「論江澤民的新安全觀」，《軍隊政工理論研究》，第六期（2002），頁29~31；黃仁偉，「新安全觀與東亞地區合作機制」，《世界經濟研究》，2002年增刊，頁24~29；潘光，「『三個代表』與新安全觀」，《解放日報》（2003年8月12日）十二版；高強，「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求是》，第十二期（2003），頁40；王存剛，「江澤民的新安全觀及其成功的實踐」，《理論與現代化》，第一期（2004），頁19~23。這些論述除了韓麗在「無處不在的威脅—新安全觀概念質疑」一文對新安全觀提出質疑之外，其他都高度肯定新安全觀的創見與貢獻。

全，其中尤以經濟安全更為重要，各國都應以合作方式，求取共同繁榮。

第二、「新安全觀」認為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是國際安全最主要的威脅來源。霸權主義的表現在於具有稱霸世界、侵略他國的動機以及壓制其他力量崛起的行為，因此在世界朝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過程中，各國力量對比的變化，並不會對現存的國際秩序造成威脅，因此安全的威脅來源並不是軍事力量的差距，而是是否有稱霸、侵略與干涉他國內政的動機。而冷戰結束後，軍事同盟的作用應隨之消逝，但是中共認為由於強權與集團政治的現象仍存，因此軍事同盟在部分地區反而有強化的趨勢，這些都不利於國際爭端的解決，對國際安全形成重大的威脅。

第三、「新安全觀」主張國際安全的基礎是共同的安全利益，以安全合作，維護地區與全球的和平與安全。所謂共同的利益是以國家利益和安全的經濟要素為基礎，在此兩種利益交叉、融合的過程中，使得國際關係出現愈來愈多共同利益結合的事例。<sup>53</sup>因此「新安全觀」主張在平等、和平的原則下，加強地區和世界各國間不針對第三方的安全合作，其方式包括多邊安全機制、多邊安全對話、雙邊安全磋商、非官方的安全對話以及促進經濟利益的融合。

### 三、「新安全觀」的評估

「新安全觀」的提出主要是針對冷戰時期以軍事同盟相互對抗的安全觀，主張平等對話、協商以解決爭端，同時提出以共同的安全利益做為國際安全的基礎，互利合作，達到共同的繁榮目標。誠然，冷戰時期權力、軍事與意識型態的對抗，對國際安全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但是這些並非國際政治的全貌，冷戰時期也存在對話、協商以及國際制度的主張與機制，也強調軍事之外的其他領域

<sup>53</sup> 參見黃仁偉，「新安全觀與東亞地區合作機制」，《世界經濟研究》，2002年增刊，頁25。

安全的重要性，因此「新安全觀」的主張，在國際政治研究的領域中並無新意，而只是在強調的重點不同。<sup>54</sup>相對的中共提出新安全觀反而對其本身具有一些新意。中共在外交政策的宣示中，早有和平共存五原則、絕不稱霸與依附任何大國等新安全觀所強調的觀念；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的安全，也以行之有年；真正能稱之為新的應當是中共積極倡導多邊主義的外交理念，而其實踐的過程，才是我們檢證新安全觀是否真正具有新意的標準。

「新安全觀」倡導的是動機論，而非實力論，中共認為國力是否強大並不是構成威脅的原因，而是一國是否有稱霸、擴張、侵略及干涉他國內政的動機。從動機而不從實力角度分析威脅的來源，在國際政治中並非新的觀念，國際政治理論認為一個國家是否具有威脅，除了檢視這個國家具備的「能力」(capability)之外，更重要的是研判其是否有威脅的「意願」(intention)。此種論點的主要目的顯然是為中共國防現代化辯護，以消除他國對中共崛起的疑慮，同時也是針對美國在歐洲與日本日益強化的軍事同盟關係。但是以動機作為是否具有威脅的依據，就有可能產生自由心證的後果，不利於國家之間互信以及國際的安全。美國當前的國家安全戰略強調以「先發制人」(preemption)制止威脅，<sup>55</sup>事實上就是以動機衡量威脅的來源。2003年3月美國就在此概念主導下發動對伊拉克戰爭，中共也譴責此種行為，可見以動機論威脅，反而會給予動武合理化的藉口。

<sup>54</sup> 大陸學界幾乎一致肯定新安全觀的價值，目前作者只發現一篇對新安全觀提出質疑，參見韓麗，「無處不在的威脅—新安全觀概念質疑」，頁64~69。

<sup>55</sup>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參見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 伍、結論

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實際上受到中共與美日兩國關係的影響，在1970年代以前，由於中共與美日兩國處於相互對抗的兩個陣營，因此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採取反對與批判的態度；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由於中共與日本、美國相繼建立外交關係，同時中共基於反蘇統一戰線的需求，甚至肯定美日安全關係的功能。1980年代中期以後，中共與蘇聯、美國三方關係趨向和解，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就採取不主動批判的默認態度。但是由於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記憶，因此如何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再興，就成為影響認知的核心因素。中共的政策選擇是同時與美國、日本維持良好的關係，防止美日兩國聯合遏制中共，同時嘗試以新安全觀促進東北亞地區安全機制的運作。因此在「新指針」公布之後，中共就積極展開與美國和日本的關係，「新指針」公布的同一年底江澤民訪問美國，雙方並建立了「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1998年11月江澤民赴日訪問，成為中共最高領導對日本進行的首次國事訪問，雖然其成效並不顯著，但是給予雙方高層互訪機制積極的動力。此外，中共也在東北亞地區倡議新安全觀，並加以具體實踐，例如積極促成「六方會談」處理北韓核武危機。在美日強化同盟關係以及日本向「普通國家」之路邁進之時，中共必然會採取此種途徑以為因應。

「新安全觀」強調與冷戰思維的軍事同盟、強權政治有所區隔，在詳加探討之後，「新安全觀」所倡議的概念在國際政治研究領域中並無新意，但是對研究中共外交政策而言，「新安全觀」所強調的多邊合作方式，的確具有重視之必要。其次，中共宣示的外交政策思想大都具有濃厚的道義色彩，例如和平共處五原則、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中國永遠不稱霸等等，新安全觀也具有這種特質，就目前而言，正如1950年代中共提出和平共處原則一般，新

安全觀是在強權政治下的和平工具，重在「韜光養晦」，以厚植實力，最終方能「有所作為」。就長遠而言，新安全觀也有改造世界的企圖，但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在於先改造自己。中國大陸內部也有對此提出深刻思考的學者，認為中共若要提出形塑世界的構想，最重要的是要「基於宏大的遠見，啟動既積極、又穩妥的政治體制改革」，<sup>56</sup>可以說是對當前中共政權尋求發展的最根本建議。

<sup>56</sup> 時殷弘、宋德星，「21世紀前其中國國際態度、外交哲學和根本戰略思考」，《戰略與管理》，第一期（2001），頁19。

## 參考書目

一、中文

人民日報。

解放日報

「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人民網。

<<http://zg.people.com.cn/GB/9508/index.html>>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jzzyhy/1128/1130/t4\\_499.htm](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jzzyhy/1128/1130/t4_499.htm)>

「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jzzyhy/1136/1138/t4549.htm>>

「導彈防禦系統真能增進安全嗎？－軍控司司長沙祖康在第二屆中美軍控研討會上的發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http://www.fmprc.gov.cn/chn/1469.html>>。

王存剛，「江澤民的新安全觀及其成功的實踐」，理論與現代化，第一期(2004)，頁19~23。

王希亮，「論『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及相關法案的出台」，國際政治（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第十一期（2000），頁91~92。

王勇，「論中國的新安全觀」，世界經濟與政治，第一期（1999），頁42~45。

吳學文主編，日本外交軌跡（北京：時事出版社，1990）。

吳學文等著，當代中日關係（1945-1994）（北京：時事出版社，1995）。

宋德興、閻學德，「冷戰後日本右翼勢力抬頭的三大表現型態極其影響」，國際政治（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第十一期（2000），頁141~143。

李秋發，「江澤民“新安全觀”探析」，南京政治學院學報，第二期（2001），頁14~17。

李曉敏，「中國的新安全觀」，和平與發展季刊，第二期（2002），頁44~47。

李寶俊，「中國新安全觀的提出及其主要內容」，中國外交，第七期（2001），頁14~18。

肖歡，「淺析冷戰後美日同盟的調整」，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第三期（2001），頁106~109。

周恩來「關於美國等國家簽訂舊金山對日合約的聲明」，「關於美國宣布非法的單獨對日和約生效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1951-1953（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

朱鋒，「『周邊事態』：矛盾與問題－對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和相關法案的思考」，現代國際關係，第八期（1999），頁23~26。

金熙德，「日美同盟的『再定義』及其未來趨勢」，世界經濟與政治，第七期（2000），頁13~18。

孟祥青，「把握後冷戰世界發展趨勢實現跨世紀國家綜合安全－江澤民新安全觀初探」，外交學院學報，第二期（1999），頁30~35。

時殷弘、宋德星，「21世紀前其中國國際態度、外交哲學和根本戰略思考」，戰略與管理，第一期（2001），頁10~19。

晉林波，「美日同盟再定義的背景、過程及其影響」，國際問題研究，第一期（1999），頁35~40。

殷燕軍，「日本新安全戰略及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載於中國外交（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第一期（2001），頁34~41。

- 高恒，「多極化世界需要樹立新安全觀」，《世界經濟與政治》，第十一期（2000），頁22~27。
- 高強，「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求是》，第十二期（2003），頁40。
- 張小明，「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劉山、薛君度主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 張歷歷，「世紀之交的亞太安全形勢和中國對日政策」，《外交學院學報》，第二期（2001），頁58~61。
- 張蘊嶺，**伙伴還是對手—調整中的中美日俄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 陳毅，「關於日本與美國修訂和平條約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1958》（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年不詳）。
- 陸忠偉，「亞洲安全中的中日關係」，《世界經濟與政治》，第三期（1993），頁23~35。
- 章一平，「冷戰後世界的新安全觀」，《現代國際關係》，第二期（1997），頁38~40。
- 馮瑞雲，「美日共同開發並部署TMD對東北亞地區安全構成威脅」，《中國外交》（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第八期（2000），頁100~103。
- 黃仁偉，「新安全觀與東亞地區合作機制」，《世界經濟研究》，2002年增刊，頁24~29。
- 楚樹龍，「冷戰後中國安全戰略思想的發展」，《世界經濟與政治》，第九期（1999），頁11~15。
- ，「亞太地區安全觀、安全結構和安全戰略」，《現代國際關係》，第五期（1997），頁2~7。
- 楚樹龍、彭春艷，「冷戰後國際安全理論的發展」，《現代國際關係》，第四期（1999），頁28~33。

- 楊伯江，「日美貿易摩擦何以趨緩？」，《現代國際關係》，第三期（1996），頁18~23。
- 楊志恆，「美日安保之沿革及其對台海安全之影響」，《戰略與國際研究》，第二卷第二期（2000）。
- 楊運忠，「美國政府進一步調整對日政策」，《世界經濟與政治》，第七期（1995），頁61~65。
- 趙慶杰、高衡，「論江澤民的新安全觀」，《軍隊政工理論研究》，第六期（2002），頁29~31。
- 劉江永，「1996-1997日本形勢報告」，《1996-1997國際形勢報告》（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1998），頁40。
- ，「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何以令人憂慮」，《現代國際關係》，第十一期（1997），頁7~12。
- ，「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與中日關係」，《1997-1998國際形勢報告》（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1998），頁18~19。
- 劉長敏，「戰後日本國家發展戰略軌跡初探」，《外交學院學報》，第四期（2000），頁39~42。
- 閻學通，「中國的新安全觀與安全合作構想」，《現代國際關係》，第十一期（1997），頁28~32。
- 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 韓麗，「無處不在的威脅—新安全觀概念質疑」，《世界經濟與政治》，第十期（2000），頁64~69。
-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 二、英文

Christensen, Thomas J.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 60.

Carter, Ashton B., and Perry, William J.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Campbell, Kurt M. "The Official U.S. View," in Green, Michael J. and Mochizuki, Mike. edited.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tudy Group Papers, 1988), pp. 85~87.

<[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jzzyhy/1136/1138/t4549.htm](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jzzyhy/1136/1138/t4549.htm)>

Finkelstein, David M.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and China's Current Security Perceptions," in Romberg, Alan edit *China and Missile Defense: Managing U.S. PRC Strategic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Stimson Center/CAN NMD-China Project, 2001. ) N. pag.

Green, Michael J., and Comin, Patrick M. edited.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Green, Michael J. "Defense or Security? The U.S.-Japan Defense Guidelines and China," in Lampton, David M. edited, *Major Power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1), pp. 76~77.

Harding, Harry.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Sanger, David E. "New Missile Defense in Japan under Discussion with U.S.," *New York Times* (Sep 18, 1993) , p. A1.

Posen, Barry R., and Ross, Andrew L.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1996/1997), pp. 9~43.

<<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security.html>>.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ebruary 1995)

Yoshihide, Soeya. "Japan's Dual Identity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presented for *America's Alliance with Japan and Korea in a Changing Northeast Asia* (Stanford, Calif.: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http://www.stanford.edu/group/APARC>>

Wang, Jianwei., and Wu, Xinbo. "Against Us or With Us?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f America's Alliances with Japan and Korea," presented for *America's Alliance with Japan and Korea in a Changing Northeast Asia* (Stanford, Calif.: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pp.9~11,17~18.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Web Site.*

<<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guide-line2.html>>.

"Japan-U.S.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Web Site.*

兩岸

Id

Nati

聯絡作者：

地址：臺北市指南路二段64號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E-mail：kschiu@nccu.edu.tw

收稿日期：2004/6/15

二稿收件：2004/6/17

審查通過：2004/7/19

責任編輯：趙文瑾

政治作

( Professor/Di

\*本文是應政  
術研討會  
助於撰文的